

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期

吴天明

摘要: 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期依据,不应是哲学理论的变化和古代王朝的兴替,而应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即治国富民理论,也就是王道思想的发展变化。以治国理论是否成熟、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分期依据,中国古代思想史应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约 3000 年,治国思想产生并成熟,主要成果为六经文本,这是“先王之道”时期;第二,春秋战国之交约 80 年,孔子师徒祖孙继承发展“先王之道”,创造孔学,这是“新王之道”时期;第三,战国子学约 300 年,两种“王道”均式微,各种新的治国理论竞相创造,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第四,汉代至清代约 2000 年,汉学、理学、心学、朴学兼容并蓄,各有千秋,但始终以“新王之道”为思想理论的核心,这是儒学时期;第五,清末民国约 50 年,学者痛感国家民族危亡,遂愤而抛弃中国全部传统思想文化,这是全盘西化时期。如此分期,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脉络都十分清晰,学者考察现代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都比较便捷。

关键词: 中国古代思想史;分期依据;分期结果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3-0099-11

根据现代考古资料和古代传世文献,中国古代国家文明史长达五千多年^①。历史如此悠久,思想文化现象自然无比复杂,以至让人经常不知从何入手,所以有中国思想史家曾经喟然长叹,中国思想史虽然十分重要,但研究对象不明,研究方法纷杂,研究过程艰难,成果又常常难以得到普遍认可。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吸收中国先人的智慧^②,暂时撇开无数的历史细节和理论细节,择其要者而考察之,并对比西方以哲学和科学为理论核心的思想文化本质特点,即可发现,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五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发生史和发展史,而且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中华文明的特质。这条主线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一定是生产力和政治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③。这条主线就是:那些负责治理国家、创造并引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贵族官僚和王官学者,即周至清代所谓的“君子”^④、孟子所谓的“劳心者”,无

论他们的时代相隔多么遥远,无论其个人和学派的具体学说、理论主张如何,始终都致力于同一件事,就是如何治理国家、造福苍生、安顿天下、庇荫子孙,同时也让自己按照社会公认的准则,合理地获取有限的私利。这一绵延五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这一无数代君子心心念念的利人利己的具体准则和实施方略,其实就是中国古代主流思想文化的根本大纲和理论渊薮,极其繁杂而又无比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主流思想文化现象,几乎莫不植根于此,鲜有例外。

最近百年的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贵族官僚和王官学者,与西方古代的宫廷学者一样,也是哲学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一样,也是哲学。这是因为,中国现当代学者所著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以及政、教、文、史、哲、法等现代专门学科的专门史,无不受到以哲学和科学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思想文化的

收稿日期:2024-11-03

作者简介:吴天明,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深刻影响。中国现当代学者大多仿照西学,以哲学理论为发展脉络,同时结合中国王朝兴替情况,给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史分期,但其分期标准明显有欠斟酌,分期结果又往往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故本文把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期依据和分期结果这一问题,单独拎出来做专门的讨论,以求教于学者方家。

一、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起点和终点

要给中国古代思想史分期,当然首先要界定时限。先说结论,下文再讨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起点应在考古学上的黄帝古城时代,约当历史学上的黄帝时代,距今大约 5500 年;终点应在清末民国时代。

要确定中国思想史的起点,先要确定六经记录的历史起点和终点。六经是公认的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古代全部主流思想文化的源头。根据最近百年的考古成果,结合古代传世文献,找到六经记录的历史起点即中国思想史的起点本不困难。但由于周朝王官在最终编订、颁行各自负责的经书时,对华夏文明史起点的看法不一,所以中国思想史的起点到底在哪里,反而成为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笔者曾推测周朝王官颁行六经的大体时间谅不晚于鲁昭公时期^⑤,那么从逻辑上反推,六经记录的历史终点谅不晚于鲁襄公时期。这一推断无论怎么论证,都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本文采取一个最简单的论证办法,以节约文字和读者的时间与精力。《春秋》《左传》均记载,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518 年),周天王庶子王子朝起兵叛乱,争夺王位,二十六年兵败,遂裹挟大量王官和王朝典籍逃到楚国。那么六经全部颁行于天下,不可能晚于王子朝兵败之年,因为王官被裹挟到楚国以后,他们就丧失了代表王朝颁行六经的所有合法性^⑥。由此可知,六经记录古史的时间下限谅不晚于鲁襄公时代。鲁《春秋》属于特殊情况,鲁《春秋》本与列国《春秋》一样,本国历代史官记录,经王朝史官统筹并审核,由列国史官自主颁行于本国。但周鲁最亲,鲁国遵守周礼最严,其地位一直远远高于列国,故鲁《春秋》记录历史的截止时间晚至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 479 年),此后《左传》遂有传无经,非常特殊。

真正的难点在于确认六经记录的历史起点。周朝王官在记录整理并最终颁行六经^⑦时,史官将五帝时代早中期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的历史如《黄帝书》《颛顼书》《帝喾书》之类剔除了^⑧,于是中国正

史始于《虞书》记录的尧舜时代,由此形成了周朝正统史学,并一直影响至今。但周朝乐官的《乐经》却将中国教化嗣君诗乐作品的起点确定为黄帝时代的《大卷》《云门》^⑨。考虑到春秋君子无不视六经为史书^⑩,并不仅仅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为史书,那么中国正史、诗教史、书教史、乐教史、礼教史等均应始于黄帝时代。周朝史官、乐官此举明显互相矛盾^⑪。

按照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的国学教育传统,春秋时代的乐教应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诗乐实践教育。如《左传》记载,春秋列国所有的外交场合都必有诗乐节目,列国官员对“周乐”(包括“古乐”和“新乐”,周代官方认可并采用的先周和周代诗乐)十分熟悉;《论语》记载孔子弟子子路曾经在孔子帐下弹琴,子游主政鲁国武城时曾经用诗乐教化当地人民等,案例很多。只是到了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完成了世俗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国家。新兴的贵族官僚们对那些多有宗教色彩、少有娱乐意味的九代“古乐”普遍缺乏兴趣,而对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多有人间烟火气、娱乐性又很强的“新乐”“郑声”“郑卫之音”很感兴趣,九代“古乐”的曲谱和歌词遂在战国时代逐步失传。其中《诗经》的歌词,因为诗歌和诗教在春秋时代已从乐曲和乐教中独立了出来^⑫,故传世至今,其余包括《大卷》《云门》在内的九代歌词则均亡佚^⑬。乐教的第二部分是诗乐理论教育,教材就是《乐经》,战国晚期至今则题为《大司乐》。这一史料说明,六经并非仅仅是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之经,而应是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之经,中国国家文明史和思想史的起点均应在五千多年前的黄帝时代。

《大戴礼记·宰我问五帝德》记录孔子讲述五帝时代故事,说明即使在受到周朝正统史学的影响、普遍以为中国历史和思想史均始于尧舜时代的情况下,孔子仍然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起点在更加遥远的黄帝时代^⑭,这与司马迁《五帝本纪》、现代考古学家关于黄帝古城的考古成果均相符。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终点,本文将其确定在清末民国时期,而不是最近百年学者普遍确定的鸦片战争之前。清末民国已经作古,当时流行全盘西化,国家并无像样的治国思想,仁人志士、乡野村夫无不救亡图存而不暇,故不得已而将其视作古代的尾声。从黄帝时代到清末民国时代,中国古代思想史大约有五千多年。

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期依据

最近百年中国学术普遍模仿西学,分为许多学科,每个学科又都分为若干二级、三级学科,每位学者各持一端,深入钻研某一方向。政、教、文、史、哲、法等现代学科的学者们对各自学科的中国历史的分期,都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分期标准和方法,但有两点却是共同的:其一,仿照西学以哲学为王,把哲学理论作为中国整个古代思想文化和各自学科的理论总纲和分期依据;其二,同时结合中国历史特点,根据朝代兴替情况来分期,一般将各自学科的中国历史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现代这么几个历史时期。这种分期方法虽然不为完全无理,但很容易出现如下情况,就是有利于学者描述各自学科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现象,却不太利于总结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理论体系、学术外延和发展规律,很容易让中国古代思想史、相关学科的发展史显得“失魂落魄”,支离破碎,脉络不清。

现代考古学家认为,中国进入国家文明时代以后,从国体、政体上讲,大体分为三大历史阶段:邦国文明时代,即考古学上的古国时代,约当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⑮;王国文明时代,即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帝国文明时代,即秦汉至清代^⑯。笔者以为,清末民国时代只是帝国时代的尾声,是一个特殊时期。由于中国远古的邦国、王国都由氏族部落演化而来,而且中国很早就开始了深度的民族融合,后世一直没有间断^⑰,各民族之间都具有非常深厚而复杂的联系;中国的自然环境又相当优渥,生活资料相当丰富,统治者不必采取欧洲那样极其野蛮残忍的治理方式获取私利,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一直大体上分为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⑱,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周代至清代分别称为“君子”和“小人”,孟子分别称为“劳心者”和“劳力者”。社会上层就是负责治理国家、不事产业,主要创造思想文化的贵族官僚阶级;社会下层就是从事农、工、商,主要创造物质文化的平民阶级。古代奴隶多为异族战俘、本族罪犯及其后代,因贫为奴者不多,奴隶总人数一直很少,从来就不足以构成一个阶级。中国除了西藏地区(因为气候极其寒冷,农耕非常艰难,物产极其稀少,生活资料难得,不奴役他人就难以生存,而曾经像欧洲那样实行过野蛮残忍的奴隶制)以外,其他地方虽有少量的奴隶,但从来就没有真正

实行过欧洲历史上那种奴隶制——中国古代从事工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不是奴隶,而是平民,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古代五千多年,三大历史阶段,长期分为治理国家的社会上层和具体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下层两个阶级。在古代,任何国家或民族,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发展方向的,都不可能是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和奴隶,而是社会上层。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才是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上的思想文化才是主流的思想文化。因此,在古代中国,君子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才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而小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从来就不是主流,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所以《尚书》说:“尔惟风,下民惟草。”孔子在《论语·颜渊》中也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就是“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

那么在中国古代五千多年中,书写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君子的思想文化,主要内容是什么,核心思想是什么呢?这要从古代五千多年历代君子的职业、职责说起,这样讨论起来比较简单。《论语·子张》记载子夏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又说:“(百工)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百工即手工业者,他们聚居在城中的“肆”(居所兼手工业作坊)里,互相观摩,互相学习,互相超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求手工技艺的日益精进,旨在创造更多的财富。子夏没有提到农民,这是因为古代农民一直住在城外,农业技术传承一直到现代国民教育发生之前,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教育体系,而长期依靠父子兄弟代代相传。治国君子则聚居在城里,活动在城中朝堂、庙堂、礼堂、学堂上,现任官员实际参与治国,候任官员学习治国理论,卸任官员评价治国情况。可见古代社会上的根本任务从来就只有一个,就是治国富民;古代社会下层的任务从来也只有一个,就是实际创造物质财富。孟子将古代这种社会分工总结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古代治国君子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治国富民,同时让自己按照天下公认的准则(具体准则,时代不同会有所变化),获取有限的私利,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声望、历史地位等。孔子将治国君子的这一核心任务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思想、行为方式总结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孔子推崇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利人利己的治国实践和理

论。总之,君子治国富民并适当获取私利,这就是中国古代五千多年历代君子的意识形态、基本思想和终极目标,这就是中国古代无比繁杂的思想文化的根本大纲、核心思想、基本理论,这就是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理论渊藪。

因此,给中国古代思想史分期,其实就是给中国古代君子的思想史分期;给君子的思想史分期,其实就是给中国的治国富民思想史分期。我们甚至可以更加明确、更加直白地说,中国古代君子治国富民、有限利己的治国之学,才是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理论核心和灵魂所在。因此本文主张,将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成熟与否、是否具有独创精神、是否发生了转折性的重大变化等这个非常简单的标准,作为中国古代十分漫长而又无比复杂的思想史的分期依据。我们应该摒弃最近百年中国学术界普遍照搬、模仿西学以哲学为王或简单根据王朝兴替划分历史时期的僵化做法。现代政、教、文、史、哲、法等学科,都只是中国治国之学在各自方面的具体化、专门化的学问,均不足以统领中国思想文化,相反,这些学科的发生史和发展史,实际上均以中国治国思想理论的发生史和发展史为基本依据。

按照上述分期依据,笔者拟将中国古代思想史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第一,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时期,前后大约 3000 年,主要依据是,中国最早的治国理论“先王之道”产生并定型,并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又无比深远的影响;第二,春秋战国之交大约 80 年,主要依据是,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治国之道即“新王之道”,并成为汉代至清代治国理论的核心;第三,战国时代大约 300 年,从孔子去世到汉武帝之前,主要依据是两种“王道”都已式微,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主要是为了寻求国家统一,但最终目标还是为了治国富民;第四,汉武帝至清代大约 2000 年,主要依据是历代学者博采众长,各有发展,但始终以“先王之道”特别是“新王之道”为治国思想理论的核心;第五,清末民国大约 50 年,主要依据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理论全部被抛弃,上流社会完全从西方寻找治国理论,中国主流思想文化具有全盘西化倾向。下文略作说明。

三、中国古代思想史五个历史时期

1. 九代 3000 年:“先王之道”时期

中国思想史的第一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

秋九代约 3000 年,即九代“先王之道”时期,这是中国治国思想理论的发生期和定型期。其具体时限,起点为考古学上的黄帝古城时代,约当历史学上的黄帝时代,距今大约 5500 年,终点为春秋晚期鲁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519 年)。如此确定终点的主要理由是,孔子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开始设帐授徒^⑨,并创造“新王之道”,而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代和战国时代早期,正是孔子师徒祖孙创造“新王之道”的历史时期。

将整个九代 3000 年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生期和定型期,笔者主要的理由如下所述。

其一,九代主流意识形态和治国方式^⑩均为人神混杂、政教合一,与战国至今的后九代明显不同。笔者以前在研究中国世俗化历史时,曾根据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否人神混杂、天人交通,国家治理是否实行政教合一这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将中国古代五千多年文明史大体划分为两大时期,即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时期和战国至今后九代时期。九代时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人神混杂、天人交通,国家治理实行政教合一;后九代时期则人神揖别、天人两分,国家治理实行世俗政治,宗教政治退离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而仅仅成为民间信仰。其中,春秋战国之交即九代、后九代之交,就是中国发生上述巨变的关键历史时期,既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也可以兼属九代、后九代两个历史时期,情况非常特殊。后来笔者在研究中国五千多年的诗教史、书教史、礼教史、乐教史等专门问题时,也根据各自问题的发展规律,将九代单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学术界多有同仁表示认可。可见,从宗教政治和世俗政治的重大转化的角度,将九代大约 3000 年单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

其二,在黄帝时代,国家治理就已成为一门深奥的学问,以至需要王官专门教化嗣君,以备嗣君未来治国之用,国学学堂因此产生。黄帝时代的诗乐作品题目《大卷》《云门》侥幸保存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可与孔子《五帝德》、司马迁《五帝本纪》以及近年出土的黄帝古城文物互证。《虞书》记载,舜帝嗣位,随即任命夔做诗乐教官,负责“教胄子”,即教化嗣君,那么夔就是国学学堂的教官即王官,“胄子”嗣君就是国学学堂的学生,其教学之所就是国学学堂,也就是朝廷的庙堂、朝堂、礼堂。这些史料说明,五帝时代即有教化嗣君的国学学堂和研究治国之道的国学学问。《礼记》《大戴礼记》所汇编的古文记载,周武王驾崩后,周成王嗣位,但新君尚未

成年,仍需要正常接受国学教育,周公就经常亲自过问成王的受教情况。大小《礼记》虽然成书于汉初,但未必需要向壁虚构,谅必有所依据。大小《礼记》和《左传》多有关于周代大夫举办家学、诸侯举办乡学(乡校)、天王举办国学的记载。孔子虽是商汤苗裔、微子之后,但家道中落已久,只是鲁国一位下大夫的庶次子,身份卑微。大约在鲁襄公时代晚期、鲁昭公时代早期,孔子接受孔氏家学的蒙学教育,并没有机会上鲁国乡学、天王国学,故至53岁时才侥幸做官^{②1}。这些史料均可证明,九代时期,贵族官僚如何治理国家已经成为大学问,历代政府均需举办国学,专门培养候任官员,以备他们未来按照“先王之道”有效治理国家。

其三,九代先王治国历史的主要成文记录,也就是六经,就最终定型、颁行于春秋时代晚期的鲁襄公、鲁昭公时期,其中《诗》《书》《礼》《乐》大约定型、颁行于鲁襄公时期,《易》《春秋》定型、颁行于鲁昭公时期。六经之中,前五经由周朝王官(史官、乐官、礼官、卜官等)直接系统记录、整理、编辑、定型^{②2}并颁行于天下,《春秋》则由列国史官各自记录、整理,并经周朝史官审定,然后各自颁行于本国。列国《春秋》均有西周史、春秋史两部分,其西周史部分,可能因为多与《周书》重叠,重要性下降,久而久之亡佚。其春秋史部分积累大约两百年,已经相当厚重,至春秋时代晚期,终于引起王朝史官的重视,可能经过王朝史官统筹协调甚至亲自审核^{②3},允许列国史官将本国《春秋》各自颁行于本国。因为有孔子师徒代代相传,故鲁《春秋》独存。他国无此幸运,故列国《春秋》均亡佚^{②4}。

其四,记录九代治国历史的六经文本,如果从历史学上讲,春秋君子均称“先王陈迹”“周召之迹”;如果从治国理论上讲,春秋君子则称“先王之道”“文武之道”。“周召”“文武”均借代古代先王,这是周人的语言习惯,旨在语言简洁而活泼。六经文本定型传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基本的治国理论乃至基本的思想文化至此定型,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现代考古学资料很难提供九代治国理论的证据,传世文献则对九代治国理论有所记录。由于古人读书全靠记诵,文字记录又极其艰难,所以古代文献记录的治国理论往往极其重要,弥足珍贵。《论语·尧曰》篇误收了孔子弟子摘录以备记诵的春秋时代鲁国传写本《虞书》的片段^{②5},记载尧舜禅让时,均叮嘱各自的受禅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你如果让天下百姓困顿贫穷、缺衣少食,那么上天给你的禄位就永远没有了。尧舜叮嘱各自受禅者的话说明,九代治国君子有无俸禄,有多少俸禄,最终要由平民百姓是否富裕、富裕程度如何来决定,这就是九代最重要的治国理论,其实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全部治国理论的核心。古人书写不便,只会抄录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文字。由此也足见,孔子弟子认为尧舜叮嘱受禅者的八个字,揭示了先王治国理论的要害:君子治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富民,即让四海苍生都衣食富足,这才符合天意民心,这样的君子才有“禄”^{②6}。如果治国君子居然让芸芸众生生活困穷、缺衣少食,这就违背了天意民心,“天”^{②7}就会完全剥夺治国君子的所有好处。君子如果想让自己获取私利,就要首先让四海苍生获取公利。后世周公创造的“礼学”理论,孔子创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利人利己”学说,其理论源头就都在尧舜这里。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远古口传史兼成文史,援引《虞书》^{②8},传说舜帝治理天下时,严厉惩罚了侵占他人剩余财富的四个方国的祭司酋长,古人称为“四凶”;重点奖励了公道、公平、公正分配方国财富的十六个祭司酋长,古人称为“八元”“八恺”。这说明,早在九代时期,社会剩余财富之多就已严重扰乱了部分君子的正常心智和行为,部分祭司酋长已经开始铤而走险,侵占他人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治理自然已经比较艰难,治理国家已经成为专门的学问。

《左传·文公十八年》还记载,周初周公亲著的《周礼》^{②9}规定:“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要求国家根据古代圣王治国富民的行事规则考察当下治国君子的道德,根据当下君子的道德付之以治国富民之事,根据君子治国富民之事考察其功劳大小,根据君子的功劳大小即苍生富裕程度确定其私利的多寡^{③0}。周公这十六个字与尧舜的八个字相比,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尧舜强调君子食之于“天”,颇有政教合一的神秘色彩;周公则强调君子食之于“民”,宗教鬼神色彩较少,这与时代进步有关,也与西北羌戎一直较少鬼神信仰有关^{③1},还应与商人重视鬼神、藐视苍生最后亡国的惨痛教训有关。其二,尧舜强调治国富民的结果,周公不仅强调这一结果,还具体讲了物色官员、任用官员、考察官员的富民政绩、给予官员粮食作为报酬的全过程。其三,尧舜、周公都强调根据治国君子富民的功劳,赋予治国君子以私利,都没有论述根据君子与生俱

来的宗教身份和政治身份赋予其相应的私利,即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说明五帝夏商周时代,治国君子为了私利不顾一切的情况还比较少见。中国最早出现海量剩余财富,与钢铁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西周末期、春秋初期出现钢铁文明,春秋时代铁器普及,大量土地被开垦,土地产出大增,手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商业非常繁荣(孔子弟子子贡就是大商人),于是天下出现海量剩余财富。贵族官僚为了获取海量财富,已经到了弑君弑父、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所以孔子强调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子各按自己的政治身份和等级地位获取相应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不得僭越。这显然是为了维护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

以尧舜、周公的治国理论为代表,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的治国思想理论,整体上看,还属于“论功行赏”的理论。这一理论实际上承认社会有剩余财富,承认出现了贫富、贵贱、贤愚的阶级分化,有了君子、小人之分,认为国家需要君子来治理,只要君子治国有功,让苍生富裕,君子就有权获得相应的私利。与之后的治国理论相比,尧舜、周公的治国理论,对如何约束君子没有系统论述,这很可能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不太高、社会剩余财富还有限、君子面对剩余财富尚能自持有关,也与治国理论草创时还比较粗疏有关。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社会剩余财富越来越多,当剩余财富多到让许多君子都发狂时,尧舜、周公那种“论功行赏”的治国之学恐怕就难以为继了,而必须设法严厉约束君子的获利行为,贵族和平民双方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那么,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了。

2.春秋战国之交80年:“新王之道”时期

中国思想史的第二个时期,为九代、后九代之交,即春秋战国之交,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合力创造孔学的历史时期。起点为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这年五月份孔子开始设帐授徒,标志着孔子开始创造孔学。根据《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孔子设帐之年,就是鲁国公卿孟僖子去世之年。孟僖子曾跟随鲁侯访问楚国,参加章华宫的落成典礼。因为不懂周礼,没有学问,孟僖子一路大失颜面,深以为耻,所以临终遗命二子(孟懿子、南容)师从孔子学习周礼,故孔子得以设帐。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推算,孟僖子卒于鲁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按照周礼确定的新的“三年之丧”^⑩,卿大夫丧期为三个月份,不必足月,那么丧期

应该于四月底届满,五月份孟懿子正式嗣位为公卿,孔子开始设帐,南容成为孔子最早的帐下弟子之一,孟懿子成为孔子最早的帐外弟子和政治经济的实际赞助人^⑪。在笔者看来,这是迄今为止对孔子设帐时间最准确的推定。

这一历史时期的终点应为周考王二年(公元前439年)左右。《论语》成书标志着孔学最终创造完成,但究竟何年《论语》成书,史料阙如,难以定论,不过仍然可以推测一个最有可能的时间段。《论语》最终的编辑者应该是曾子弟子^⑫,而曾子弟子编定《论语》最可能的时间,应该在曾子去世前后,故笔者以前假定曾子去世之时即为《论语》成书之时。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前言》推定曾子卒于周考王二年,由此算来,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合力创造孔学,从孔子设帐到《论语》成书,前后耗时大约80年。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将孔学并入儒学,再将儒学并入子学,以与古代六经相对而言。李学勤先生也曾主张,只有六经之学才是真正的经学,包括孔学和战国子学在内,均为子学。冯友兰先生主张,秦汉以前均为子学,秦汉以后均为经学。三位大学者各有道理,其共同之处是,认为孔学并没有汉代至今的世人想象的那么重要,孔学时期不足以单独作为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本文主张将孔学时期单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主要原因如下所述。

其一,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称孔子之道为“新王之道”,显然是将孔子之道与九代“先王之道”相对而言^⑬。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其建议,从此影响后世中国两千多年。中国文化被视作儒家文化,即与孔学“新王之道”有别于“先王之道”的特质有关,也与孔学对后世汉唐“汉学”、宋明“理学”“心学”、清代“朴学”“汉学”的影响有关。

其二,孔学对“先王之道”有五个重大理论创新^⑭。第一,九代治国无不实行政教合一,孔学主张实行世俗政治,孔学遂成为战国至今后九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治国思想世俗化的标志性转折点。第二,九代要求所有君子治国富民,孔学则主张,如果君子实在无法实现理想,可以宽恕自己,同理亦可宽恕他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才是孔子恕道的本意,才是后世治国者理解并认可的本意,后世经师学者无限抽象化的恕道乃后世经师学者之意。第三,周代认为所有贵族官僚都是君子,孔学则认为,只有真诚并且终生治国富民者才是仁德君子,否则

也都是自私自利的小人^{②7}。第四,春秋君子推崇所有的“先王之道”,孔学则认为,不取任何私利的五帝之道(孔子等春秋君子均误认为只是尧舜之道,而且均误认为尧舜不取任何私利)和自私虚伪的春秋之道均不可取,只推崇夏商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的利人利己之道。第五,君子获利的依据,九代先王均主张“论功行赏”,孔学则主张“按位取酬”,以维护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有此五大理论创新,孔学的确称得上是“新王之道”,可与“先王之道”并称。

其三,战国子学在理论上实际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六经,二是孔学,足见孔学地位堪比六经。如将孔学并入子学,则掩盖了孔学的经学地位。

其四,由于六经文献繁杂,汉代开始学者学习六经文献的难度就已经很大,而且到了新时代,六经治国理论显示出上述不足,孔学有上述长处,所以汉代至清代的实际治国理论,多以孔学为核心指导思想。即使如今,孔子和孔学也是中国五千多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将孔学单列,方可显示其非同一般的历史地位。

3. 战国时代 300 年:子学时期

中国思想史的第三个时期为战国子学时期,起点应为《论语》成书之年,即杨伯峻先生推定的曾子去世之年、周考王二年(公元前 439 年)前后,终点应为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之年,即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前后大约 300 年。我们常讲的战国子学时期,其实应该包括汉武帝之前的汉初 60 多年。

《韩非子》记载孔子之后,儒学一分为八,颇为复杂。今观传世文献,孔子徒子徒孙中,实际上只有曾子一派才真正继承了孔子“新王之道”的衣钵^{②8},其余弟子大多去创造新的治国学问、探索新的治国之道去了,因为当时最紧要的问题是解决天下如何统一的问题,所以开创了纵横家、法家、兵家等不同学派^{②9}。六经颁行天下,王朝典籍被王子朝裹挟到楚国,孔子去世大约百年以后,宋国创造了墨学,楚国创造了道学,可见战国子学实际上都是对“先王之道”“新王之道”的继承、发展、分化、细化和异化。汉代以来,儒学的地位一直远远高于子学,中国文化或称为儒家文化,确有一定的道理。

战国时代至汉初,六经之学和孔子之学实际上均未成为定于一尊的治国之学,各种各样的治国理论非常多,列国诸侯亦根据实际情况而各有选择,其

中最主要的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指出,六家虽言人人殊,但殊途同归,其实均为治国之学。司马谈虽然只举了六家的例子,并非表示战国子学只有六家;虽然只说六家为治国之学,其实是泛指所有子学最终均为治国之学。也就是说,战国子学的本质属性与六经之学、孔子之学是完全一致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见解,既洞察入微,又高屋建瓴。

4. 汉代至清代 2000 年:经学时期

中国思想史的第四个时期,为汉代至清代的经学时期,亦可称为儒学时期,起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即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年,终点为清宣统帝逊位之年,即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建立共和之年(1911 年),前后 2045 年,举其成数,就算 2000 年。

汉代以孔安国、郑玄为代表的官方学者,进一步编辑整理研究六经,如汇编《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为《尚书》,吸收孔学研究六经的成果,一字一句解读先秦经典,阐发六经的义理,形成以孔学为核心的汉代儒学,这成为汉代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治国指南。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儒学初衰,唐代以孔颖达为代表的官方学者,对儒家经典又作出官方解释,恢复汉学传统,恢复以儒学为官方思想理论核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五代十国战乱频仍,儒学再衰,宋代学者为光大儒学、一统天下,遂另辟蹊径,创造理学(新儒学)。宋元天下又乱,儒学三衰,明代学者为发展儒学、安定天下,遂创造心学,使之成为官方主流思想文化。宋明学术虽对儒学发展有所贡献,然有三大弊端:其一,好发宏大议论,不免流于空疏,故清初学者顾炎武、王夫之等严厉批评其空疏误国。其二,儒学原本主要是治国富民之学,注重事功是其当然的本色和根本的目的^{③0},宋明学者却逐步将儒学演变成以修身养性为主之学,中国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遂由外向转而内敛,由注重事功转向注重修身养性。其三,宋明理学、心学要求治国君子不取任何私利,这完全违反了人性,完全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是利人利己的“先王之道”“新王之道”、战国子学、汉唐汉学的历史大倒退,导致明清两朝双重人格的伪君子层出不穷,可谓贻害无穷。清代学术虽痛改宋明空疏、内敛、去物欲三大弊端,恢复汉唐儒学朴实传统,注重研究先秦典籍,号称朴学(汉学),然而又太注重“小学”,对“大学”之道关注不够,而且太讲门派师承,反而有失格局。

汉代至清代的治国实践和思想理论,虽然不断吸收了历朝历代各家各派许多新的学问,但始终都是以孔学为思想理论核心的儒学,故世界各国均认为,中国文化为儒家文化,孔子和孔学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汉代至明代,中国长期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科学技术亦长期位居世界最前列,说明这一时期的治国思想虽然并无太多建树,但治国实践成就非凡。

5. 清末民国 50 年:西化时期

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五个时期为清末民国时期,具体时间为 1905—1949 年,为了方便记忆,就算 50 年。这一计算方法与上文将清代终点确定在 1911 年有所重叠,但是别无办法,因为历史发展从来不会“齐步走”。1905 年,袁世凯、张之洞上奏清廷,要求废除科举,一心一意办好新式学堂。随即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从次年开始废除隋唐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一废,则绵延五千多年培养候任官员的国学学堂必废。1912 年,民国政府首任教育长官蔡元培要求废除尊孔读经,于是古代治理中国五千多年的治国之学亦废除,成为少数学者的书斋学问。中国遂效仿西式学堂设置现代学堂、现代学科,实行国民教育,其培养对象为平民百姓,培养目标为国家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并非特意培养治国理政的官员。

宋明新儒学、心学有上述三病,其不适应国家治理新形势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但宋明时代世界各国大多原始落后,许多国家甚至还未产生,尚处在部落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未变,经济总量仍然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至清末民初,西方已经发生两次工业革命,早已弯道超车,后来居上,而中国仍然沉浸在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帝国的自我陶醉之中,所以当西方海盗携带坚船利炮和思想文化反复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灭文灭种的现实危机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遂轰然倒塌。于是清末民国先贤无不痛心疾首,因此不免矫枉过正,愤而将中国古代一切思想文化甚至包括汉字在内,均视为必须废弃之物,主张全盘照搬西方。许多基本不符合甚至完全不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实际情况的理论主张,就都来自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

这里需要补充说几句话。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学术界一直习惯于将其划分为近代、现代两个历史时期,其理论依据主要是社会政

治结构的改变,其客观依据主要是王朝兴替。这样分期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过于琐碎,格局太小;二是没有反映中国社会的深层次变化。清末民国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上与古代五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不同,下与中国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迥异,万不得已,只能将其视作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最后的回响,而且是杂乱无章的回响。这就是本文坚持将清末民国时代单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原因。

结 语

综合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的结论。

其一,治国富民、有限利己的王道思想,才是中国古代五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主脉和灵魂。这一根本的思想理论,《商书》称为“王道”,周公称为“礼”,春秋称为“先王之道”,孔子称为“仁”和“礼”,董仲舒分别称为“先王之道”和“新王之道”,汉唐称“汉学”,宋明称“理学”“心学”,清代称“朴学”“汉学”,汉代至今通称儒学,名称虽异,本质实一:治国富民,有限获利。这八个字,就是中国古代五千年王道思想的主脉和灵魂。从这个角度来讲,造福苍生,孔子称为仁学;有限利己,孔子称为礼学。仁学亘古不变,礼学则需与时俱进。

其二,中国古代礼学思想变化的依据,本质上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决定。礼学思想和礼法制度发展变化的基本依据,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而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则是因为社会剩余财富的积累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剩余财富其所以海量增加,是因为生产工具的进步导致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因此我们甚至可以非常明确地说,过去五千多年中,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总是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礼学思想的发展和变革。

其三,仁学思想亘古不变,礼学思想的变迁则反映了过去五千多年中国的兴衰存亡、朝代兴替。

九代“先王之道”曾成功治理远古中国大约三千年,并给中华民族的每个子孙都深深地烙下了中华思想文化的印记,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世界绝大多数文明体以千年计,“先王之道”当然功不可没。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先王之道”的裕民思想,实际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全部的文明史。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夺目,实行裕民政治是非常重

要的原因之一。

到了九代晚期的春秋时代,铁器已经普及。铁制工具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乃至思想文化^①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海量的社会剩余财富。这些海量剩余财富已经完全唤醒了几乎所有治国者的贪婪之心,贪婪的统治者遂将社会政治秩序完全冲垮,土地兼并无处不在,井田制彻底崩溃,“论功行赏”的“先王之道”已不再适合治国^②。所以在春秋时代晚期,九代六经最终定型并颁行于天下时,“先王之道”的仁学思想部分即富民理论虽然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先进性,但其礼学思想部分即“论功行赏”理论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也就是说,在“先王之道”定型时,它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故孔子一派创造了力主“按位取酬”的“新王之道”,旨在维持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从而保障劳心者和劳力者双方的根本利益^③。但从孔子到汉武帝之前的三百年,中国面临的最重大、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统一国家、安定苍生,天下诸侯及其帝师王官即诸子百家,当下的主要目标是统一国家(长远目标当然还是为了富裕苍生,并让自己和子孙获取相应的私利,故司马谈认为子学仍然是治国富民之学)。对当下急切统一天下无所贡献的“新王之道”,三百年中始终无法派上用场,儒学只得勉强传承,气若游丝。

从汉武帝到清代,中国治国之学的富民目标始终未变,其礼学思想部分则长期保持了博采众长、自我革新、不断调整发展的优秀传统,这是儒学能成为汉代至清代中国思想文化主脉的根本原因。但儒学的这种自我调整和发展,只有在相对封闭、华夷一家的传统中国才起作用,而难以面对激烈动荡的工业化和工业化,更难以面对完全不同的人种和文化。到了近代,中国被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反复杀戮抢掠,古代治国思想的不足开始暴露:由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优渥,故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一直非常发达,汉代至清代,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高达世界经济总量的3—8成。加上中国的民族环境亦相当优渥,先民早在邦国时代之前就开始了民族大融合。所以从整体上看,与自然环境、民族环境都十分恶劣,生存极其艰难,不得不实行野蛮的奴隶制和海盗制,不得不发展现代科学的欧洲相比,中国古代政府和学者深入琢磨治国之道,尤其到了帝国时代后期,长期过分注重社会秩序,压抑了社会活力^④,长期忽视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对创造财富的巨大作用^⑤,缺乏发展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的内生动力。这是古代思想文化到明清两代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地方,也

是清末民国西化思潮的唯一合理解释。

其四,中国过去五千多年,礼学思想的调整发展,总是大大落后于时代,大大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剩余财富的积累速度,其原因就是,古代治国者成为既得利益者以后,为了维护自己远远超出礼法规范的既得利益,阻止礼学思想和礼法制度的变革发展,最后让统治者自己乃至天下苍生、国家民族都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国过去几千年的所谓王朝兴替,所谓“历史周期率”,根本的原因都在这里。

中国古代以治国之学为思想文化的理论核心,欧洲古代以哲学和科学为思想文化的理论核心,各因其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经济发展状况、民族融合程度、社会政治结构而产生,各有长短。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期依据和分期结果,只是想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尽可能作出冷静客观的分析,尽可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并无任何主观上的褒贬抑扬之意。

注释

①近几年仍有学者坚称中国国家文明史始于尧舜时代,甚至始于夏代。说中国国家文明始于尧舜时代,这是受到周朝史官的错误影响,不知六经皆书,忽略了《虞书》之外的史书;说中国国家文明始于夏代,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全盘复制西方历史学说,完全套用欧洲历史发展阶段理论,按照欧洲模式强行给中国古代史分期,认定中国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即所谓奴隶制时代)。而且这两种史观,不了解或未考虑中国现代考古成果,完全不值得辩驳。②孟子一生反复总结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孟子》还特意用“卒章显志”的方式,系统总结了这一规律,以提醒后世子孙。司马迁、韩愈等均反复总结这一规律。后世学者多把这一规律叫做“道统”。“道”即《商书》所谓“王道”(“王道荡荡”),春秋君子称“先王之道”,董仲舒称“先王之道”“新王之道”。这些文献都极大地启发了我们,让我们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主脉。③12000年前的旧石器和原始农业手工业,催生了舞阳文明;9000年前舞阳文明的新石器和村社,催生了5500年前黄帝的邦国;夏代的青铜器,催生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的王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铁器,既让中国进入后世2000多年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也让汉代以后的中国长期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明清两代错失工业现代化的先机,中国几乎亡国,遂愤而抛弃中国的一切。古代五千多年中王道几经沉浮,几经变革,大凡王道思想理论适应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王道荡荡”,不适应则“王道”式微。王道的命运和自身的发展调整,实际上一直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剩余财富积累程度、社会政治关系和谐与否来决定。④周代之前治国者并无通名,平民则通称“下民”,周至清代通称治国者为“君子”“人”等,平民则通称“小人”“庶民”“民”“氓”“百姓”等。可检索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十三经索引》。叶圣陶主编:《十三经索引》重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⑤六经颁行时间的考证,详见吴天明:《论国学》,《中州学刊》2024年第2期,第118—131页。⑥王子朝挟挟王官和典籍逃走之后,周王朝就再也不是天下思想文化的中心了,鲁、宋、楚成为新的中心。后来鲁国创造儒学,宋国创造墨学,楚国创造道学,而周王朝再无任何

新的创造,主要原因就在这里。^⑦从战国时代的子夏、孟子直至如今,学者长期认为孔子最终确定了六经,故一直有“孔子成六经说”,但历史事实是,“成六经”者为周朝王官。详见吴天明:《“孔子成六经说”考辩》,《学术界》2022年第10期,第129—140页。^⑧剔除的原因,司马迁《五帝本纪》称,是因为“不雅驯”,就是五帝时代早中期历史记录,后人经常难以理解,如“黄帝二十五子得十二姓”“君子重孙不重子”之类,可能春秋君子就难以理解了。现代用人类文化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均可给予科学解释。^⑨中国在春秋时代以前,贵族官僚一直无视民间音乐和音乐教育活动,春秋时代才开始有所变化。故乐教这个概念并非泛指所有的音乐教育活动,而只是对候任(国学学堂的学生)、现任、卸任治国官员进行的治国教育其中的一种。详见吴天明:《乐教论》,《中州学刊》2023年第5期,第126—138页。^⑩春秋文献均称六经为“先王陈迹”,《荀子》称六经为《书》,清代学者称“六经皆史”,看法始终一致。^⑪周朝王官确定六经时,除了《书》《乐》矛盾以外,其他自相抵牾者还有:《诗》只收周代华夏列国之诗,先周古诗和周代蛮夷戎狄之诗一律未收;《易》只收《周易》,先周古易如《连山易》等一律不收;《礼》只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周公亲著《周礼》),先周古礼及周代蛮夷戎狄之礼也一律不收。周朝王官此举,说明他们颁行六经,旨在统一周朝天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治理国家的思想理论。^⑫春秋时代,诗可如古代那样歌舞,也可单独朗诵,故诗和诗教得以独立。^⑬大量传世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官方乐教作品就是黄帝时代的古乐《大卷》《云门》等,这些作品一直流传至春秋时代。详见吴天明:《乐教论》,《中州学刊》2023年第5期,第126—138页。^⑭孔子在讨论治国之道时,有时又从尧舜时代说起,说明他的看法并不坚定。好在现代考古成果足以证明,黄帝时代是中国国家文明的起点。^⑮何为五帝,古来争论不休,正好说明邦国时代的可靠性,这与何为春秋五霸而争论不休的情况相似。五帝时代群星灿烂,哪五颗“星”最亮,古人见解不一。本文采取荀子的见解,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一三五七九古来常为极数,故古人常常有意凑足极数之数(含极数的倍数如三十六计、三百篇等)。^⑯以上只是考古学家的大体分期,不可能尽善尽美,因为历史发展有一个渐变的过程。邦国时代后期的尧舜时代就具有王国时代的部分特点(如舜帝处罚“四凶”,奖励“八元”“八恺”),王国时代后期的周代就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如天下所有诸侯都必须得到周天王的认可方有合法性,大国上卿都必须由周天王亲自任命,诸侯只能任命自己的下卿,礼乐征伐都必须出自周天王等),只是周代中央集权的集中度不如秦汉至清代那么高而已。^⑰迄今为止我们所知最早的民族融合,是八千多年前,原本生活在黄河上游渭水流域西北羌戎的一支少昊氏,从黄河上游发展到黄河下游的太昊氏地界,最终成为东夷族系的新首领,故史称少昊氏。这种融合发展至西周时代,周初周公召见天下诸侯时,天下所有诸侯,包括蛮夷戎狄,均自愿臣服于“周”即“华夏”(所以西周时代春秋初期实行了有限中央集权,《左传》中尚保存了“周”即“华夏”的古意)。西周之后,虽然蛮夷戎狄自外于“周”“华夏”,但经春秋战国五百年的战争与和平、融合与发展,华夏与蛮夷戎狄重新融合为“汉”。唐代进一步融合为“中华”,清代进一步融合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自然有战争因素,但主要还是经济和文化先进的民族吸引帮助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民族,落后民族亦一直认可倾慕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将其总结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近万年以来,华夏关系固然无比复杂,几千年以来无数学者都一直在反复研究,笔者以为亦极其简单:华夏是经济和文化先进的蛮夷戎狄,蛮夷戎狄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

华夏,华夏古今一直都是一家。^⑱近年所谓“中产阶级”即社会中层,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后的产物,中国古代并无这一阶级阶层。^⑲司马迁误读《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左传·昭公七年》,故其《史记·孔子世家》将孟僖子卒年和孔子开始设帐之年,均误定为鲁昭公七年。^⑳《周书》记载,周武伐纣时,连续两次占卜均不吉利,武王仍然发动进攻并大获全胜;周公去世后,伯禽将周公太庙与鲁国朝堂分开建设,庙堂朝堂分开建设遂成为周代列国惯例;郑国子产明白砍伐树木并不利于下雨;齐国晏子反对宗教治国。西周春秋时代人神两分、绝地天通的这类案例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但即使案例再多,也仍然不足以改变整个九代时期人神混杂、天人交通、政教合一的基本格局,故本文要特别强调“主流”云云。^㉑鲁国权臣“三桓”落难,被阳虎实际控制时,孔子拒绝了阳虎的拉拢,故受到“三桓”赏识,得以做官。^㉒在周朝王官系统记录之前,古史应以口述史为主,兼有少量成文史,这与当时记录材料尚未成熟有关。详见吴天明:《书教论》,《湖北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第161—168页。^㉓《国语》记载,宋国正考父(孔子祖先)曾请王朝乐官审核十二首《商颂》的音律,而传世《商颂》仅有七首,说明王官删除了五首。故本文作此推测。^㉔列国《春秋》流传情况,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79年版。^㉕根据《论语》的编辑思路,《尧曰篇》当为后人误收,至于何人何时因何误收,史料阙如,已难以断定。详见吴天明:《论语本意·尧曰篇》,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㉖禄:在战国以前政教合一的时代,本指祭祀天神祖先神(二者混杂)的祭肉、主持祭祀的权力、主持分食祭肉的权力、主持政务的权力、获取利益的权力。在战国至今的世俗化时代,则仅指世俗的官爵禄位。^㉗政教合一时代天人合一,世俗化时代天人两分。甲骨文中的“天”字,像人之形,指死后归天的祖先,尚保存了古国时代的古意。^㉘春秋时代鲁国传写本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当时统称为《书》。按照国学传统,孔子曾用之做弟子教材,后来藏于孔子旧宅夹壁中,汉初被发现,遂被合编为《尚书》,取上古史书之意。详见孔安国:《尚书正义·尚书序》,《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㉙周公《周礼》原文仅存这十六个字。根据传世文献,虽然周人言必称礼、周礼,但所引是否为《周礼》原文,已无法断定。周公所著《周礼》大约在战国时代失传,传世《周礼》为战国末期私人的编著,其中有多少来自周公所著《周礼》,亦无法断定。^㉚远古中古农民交税、官员俸禄均以粮食计算,故“食民”即食之于民(的税收)。^㉛例如夏人也是西北羌戎,就较少鬼神巫术之事,此由孔子称“夏人野,殷人鬼,周人文”可以推知。《礼记·表記》记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周人经常自称夏人,其实夏人周人都是同时代的羌戎,周人并非夏人之后。夏代,夏人经济文化非常发达,而周人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周人自称夏人,这是“乡巴佬冒充城里人”。^㉜商代的“三年之丧”丧期为二十五个月,三个年份,不必足年。周代的“三年之丧”规定的丧期,天子及王后七个月份,诸侯及夫人五个月份,大夫及内子三个月份,士及其嫡妻两个月份,均不必足月。详见吴天明:《孔孟倡导“三年之丧”的政治目的和文化考量》,《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96—103页。^㉝古代三级政府(中央政府、封国郡县、大夫乡邑)举办国学序列,不仅免收一切费用,还要负责弟子衣食。孔子家贫,而且此时尚未做官,没有俸禄,无力承担弟子的开销,没有孟氏的大力支持,不太可能设帐。细读《论语》,孔子对孟懿子说话一直很客气,对南容说话则完全是老师口吻(典型例子如《论语》2.5章、5.2章),也可印证本文的推测。^㉞

宋代学者认为有子的弟子也是《论语》的编辑者之一,理由是《论语》对曾子、有子均特别尊敬。本文考虑到曾子传世语录很多且均称“曾子”,有子传世语录很少,故推测更大的可能是曾子门徒最终编订了《论语》。^⑤董仲舒明里暗里将“新王之道”理解为孔子一人之道,笔者认为“新王之道”是以孔子为主、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的合力创造。^⑥本文是中国思想史总论。孔学对六经的重大理论创新,本文只是择要言之,作者另有专论详细讨论这一问题。^⑦“大德”为万世不变的治国之道;“小德”只是小长处、小名声,不可能真正治理国家、造福苍生。详见吴天明:《“大德”“小德”辨》,《学术界》2022年第5期,第113—121页。^⑧对后世影响最重大而深远的“(子)思孟(子)学派”,即为曾子所传。^⑨曾子门徒编辑《论语》时,将原始记录中的卜子(子夏)、言子(子张)等统统改为只称其表字,笔者推测就是因为曾子师徒认为,这些同学在先师去世后,至少部分背叛了先师孔子,不应该继续受到特别的尊敬。^⑩如孔子要求弟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行”即践行、实行、躬行(治国之道)。孔子所言“三人行”之“行”亦此意,与走路之类没有关系,后世经师学者对此多有误解。^⑪中国春秋时代以前的“书”大都是口述史和成文史的混合体,完全的成文史很少。后来由于铁制工具可以

大量加工记录文献的“方策”,春秋时代那些“混合体”史书,均被记录整理成为分门别类的成文史,以至中国的口述史传统早在春秋时代就已断绝。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解释“书”字时,都误以为“书”仅仅是笔、用笔书写、成文史等含义,而不知“书”还有口、口述、口述史的含义。可见铁器普及对促进春秋时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意义有多么重大。^⑫古今无数学者将这一切简单归结为西周灭亡、王室衰微,并不可取。^⑬最近百年中国许多学者都认为,孔子“按位取酬”的礼学理论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是为了“恢复西周奴隶制”,因此这一理论是反动的、开历史倒车的。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汉代以来,中国一直实行“按位取酬”。“西周奴隶制”本身就是套用欧洲历史发展阶段理论的说法,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本文已有论述。至于“古”是否一定错误就更加无须讨论,因为正确与否与年代并无必然联系。^⑭中国历史学家早已发现了一个规律,上古、中古时代中国社会充满活力,明清两代社会越来越压抑,说明社会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孔子的礼学思想理论需要变革。^⑮中国明代以前科学技术虽然发达,但科学家基本上都没有官方背景,入不了主流,孔子“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子夏“君子不为”(《论语·子张》)一说就是对这一现象的高度概括。

The Stages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Wu Tianming

Abstract: The basis for dividing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should not be the changes in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dynasties, but rat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which governed the country and enriched the people, that is, the development of kingly way of governance. Based on whether the theor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s mature and whether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occurre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 the first is The Five Emperors, Xia, Shang, Zhou,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hich lasted for about 3000 years, during which the idea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emerged and matured. Its main achievements were the texts of the Six Classics, which was the period of the “Way of the former kings”; The second is around the 80 years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during which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Way of the Former Kings” and created Confucianism, which was the period of the “Way of the New King”; The third is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lasted for about 300 years, during which both old and new kingly ways declined, and various new theories of governance competed to create. This was a period of “a hundred flowers blooming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ing”; The fourth i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around 2200 years, during which many schools such as Han studies, Neo-Confucianism, Mind studies, and Pu studies were all inclusive and diverse, learning widely from others’ points and each had its own advantages. However, they always centered around the “Way of the New Kings”, which was the period of Confucianism; The fifth i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lasted for about 50 years, in this period scholars felt the pain of losing their country and angrily abandoned all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and culture. This was a period of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Through such stages, the basic theori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are very clear, making it convenient for scholars to examine relevant theoretical issues in modern disciplines.

Key words: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basis of periodization; results of periodization

责任编辑:涵 含